

2024
年度盘点
军旅文学

书写具有钢铁品质的精神气象

——2024年军旅文学创作概览

□锦乔

2024年军旅文学创作的精神内核是书写具有钢铁品质、具有顽强风骨的军人特质,表现为专注现实题材领域强力发声,切近生命体验,在多维表达中描绘军人的本真情态,在宏大背景下挖掘个体的意义,构建新历史观等鲜明特征。同时,来自基层的青年力量,也为军旅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2024年是新变化、新现象迭出的一年。一方面,时代的飞速变革、技术的迅猛发展令人目不暇接,深度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另一方面,跟随强军兴军的步伐,军旅文学在创作题材和写作方法上不断掘进,而军旅作家的写作观却愈发趋向一致,塑造出2024年军旅文学的精神内核:书写具有钢铁品质、具有顽强风骨的军人特质。

专注现实题材领域强力发声

回顾过去一年的作品,2024年的军旅文学表现出如下几个鲜明特征:一是专注现实题材领域强力发声。近年来军旅文学现实主义的写作传统强势回归,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家们有意识地追踪时代脚步,记录时代印记,关照时代经验。身处和平年代,写作者更为关注没有硝烟的战场,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戍守边疆的普通官兵,将自我沉淀的生命体验与军旅生涯的内在气质相结合,以不同视角书写艰苦条件下军人坚韧不屈的精神品格。

王族的长篇小说《零公里》直面现实,以纯粹且真挚的文学态度书写了一部驻边军人的信仰传奇,精准提炼出军旅文学的核心主题: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作家对驻边生活极为熟悉,选择将更多的笔墨用来记录普通军人的日常,实际上,这部作品的写法非常清淡平实,几乎所有人物的行动都围绕一座昆仑山展开。即便一些次要人物的活动轨迹超出了昆仑山的范围,但他们的故事和情感也与这座山密切相连。汽车营的军人们时常往返于山上、山下,一年中上山的时间无法提前预测,一纸命令、一个电话的召唤都可以成为从“零公里”进发的号角,于是,新一年的生命赌注就牵系于平均海拔5500米至6000米的昆仑山上。这座山鲜有人涉足,被称之为“生命禁区”。日常之于高原的官兵来说就是轮回般的生死考验,是不期而遇的暴风雪,是随时可能侵袭的致命病痛。这些超脱出寻常框架的日常生活,呈现出一种粗粝的情感质地。作家以近乎轻盈的语言来描述昆仑山的寻常生活,读者能时时感受到暗含的矛盾,感受到普通人与极端自然环境之间的撕扯,人物内在的性格张力也随之凸显。

同样是聚焦高原生活,卢一萍的《查果拉》具有与《零公里》相似的特质。作家表达了极端气候对守护者的摧残:对于脆弱的生命来说,高原就像肆虐的屠夫。查果拉官兵的牺牲是默默无闻的,对身体的危害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当没有尽头的伤害笼罩在每个个体身上,生命之重如千钧之石令人窒息。然而,顶嘎边连每个官兵都把能驻守查果拉视为军旅生涯最高的荣誉,也把战友视为生命中最重要存在。面对生命禁区,个体无疑是脆弱的,但血肉之躯团结起来足以对抗肆虐的环境,强大的信仰之力亦能穿透黑暗,为默默坚守的人们带来无限光明。

王凯的小说集《绿沙漠》书写了戈壁滩上军官的喜悦哀乐与爱恨情仇。王凯擅长在粗犷环

境中捕捉人物最柔软的内心,完善他记忆中平凡却不平庸的小人物,为值得书写的一兵一卒列传。作家将日常化和个人化带入对军人形象的摹写之中,把真性情和真本色倾注到这些人身上,既还原了真实的军人形象和军人个性,又保持了理想主义的底色。《沙漠里的叶绿素》《途中》《星光》等小说中那些遭遇理想与现实矛盾、身陷情感与道德困境、面临追寻与放弃抉择的普通军人身上,可以看出作家对于军人职业与生命本质的深刻思考。中篇小说《星光》写了名叫“刘宝平”的普通一兵,故事抽丝剥茧般在层层矛盾中递进,最终指向作家创作中不变的核心——凸显、挖掘普通一兵明亮的精神品格。

西元在历史战争的写作中积累了足够丰富的经验,近两年回归到现实题材写作,磅礴扎实的历史知识让作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现实与历史的承袭逻辑,因此他的新作无论意蕴还是细节方面都较以往更加夯实。2024年,西元的创作成果颇丰,《大校、上尉和列兵》《在钢铁中发芽》《徒步走到终点》三个中篇小说是作家紧跟现实、进行新的生活积累的转型之作。如同《徒步走到终点》所表达的那般,作家试图通过一次巡逻小分队深入部队的所见所闻,探查当下青年军人最为真实的内心世界,了解新时代军人最本相的生存境遇,为作家的文学版图开拓新的疆域。

切近生命体验,描绘军人的本真情态

2024年度军旅文学创作的第二个特点,是切近生命体验,在多维表达中描绘军人的本真情态。军旅生活相较于都市日常是单调的,作家们面对同一主题贡献了各自个性化的表达。

温亚军的《嫩骨西风》写驻边青年官兵的生活,切入角度巧妙。作家以一场“事故”为线索引出故事。军校毕业的年轻排长翁家林是边防军营的异类,他的书卷气、善于思考的特质和戈壁荒漠的基层连队格格不入,在战士朱健是否打人、是否需要处理的问题上,翁家林做了一系列积极却实际无果的努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怀疑、事实的真相和实际结果、对未来的渴望和实际的生存境遇形成反差,小说以平淡的叙述语调不断叩问当下戍边官兵的生存意义,带给读者思考与启迪。

李骏的《西北望》是一篇有突破性的小小说。作家有着多年戍边和都市机关工作的双重经验,在这篇小说里,两种经验巧妙融合,并且直指当下部队的痛点和热点。主人公“我”一面应对单位反腐艰巨的工作,一面通过搭档张副团长儿子远赴边防的工作经历,回忆并重新发现当下年轻军人戍边的意义。过往的激情岁月,现实工作的艰巨甚至危险,在两代人和两种鲜活境遇中腾挪转换。主人公的关注视点时远时近,作家通过这篇小说写出了军人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跌宕起伏的生存境况。

曾皓的短篇小说《寻找一只羊》展现出作家

一贯的智性思考,在充满悖论的情节设置中探寻文学的多样可能性。作品借寻找羊的经历写炮兵的生活,通过“羊”的多重隐喻和官兵们“寻找”的努力,试图呈现出军人对胜利的渴望,以及如何实现战争背景下对每个普通生命的关照和怜悯。作家通过这种探索,展现高科技条件下军人对自身坐标的寻找和定位,以及对现代战争和传统观念的伦理思考。

以家庭视角展现军营生活也是作家们共通的选择。石钟山的《爱情永远是年轻》提炼出爱情的主题,在这个主题线索下展现普通人的人生选择,在涉及爱情、伦理和责任的多重考量下或成功、或失败、或积极、或沉沦,充满人生况味。文清丽往往能从一个现象出发,辐射出不同人对待同一境遇的文学主题。《隐形敌人》以丧偶军人再婚为主题,尝试让有着坚硬棱角的军人融入生活的洪流中,表现各自的命运轨迹。董夏青青的《停云蔼蔼》有着现代性写作的特点。利文在医院陪同母亲看病的间隙,与朋友朵绘进行了短暂的碰面。在有限的交流中,两个青年人各自的成长经历徐徐铺开,彼时彼刻与此时此刻形成相互映照,昭示着当代生活的种种纠葛与错位。程多宝的《亲亲我的宝贝》描写一位父亲对于营盘服役的儿子的思念。当父亲因为一个偶然机会路过儿子的营盘,远远望着对面那个“似曾相识”的儿子,却悄然挥泪告别,将相思之苦埋于心底。

贾秀谈从影视转向文学的创作令人耳目一新。《这个岛依然醒着》《等候蓝月》等作品聚焦海岛上青年军人的故事。作品灵感大多由采访经历得来,作家试图用一种极致细腻的描述方式,营造全方位空间氛围,捕捉身处这一空间中挥汗如雨、热血沸腾的身影和安静时缓缓流淌的浪漫与柔情。贾秀谈的小说洋溢着青春气息,人物性格、命运与环境紧密融合,呈现出新颖而独特的叙事氛围。

来自基层的青年力量,为军旅文学注入新的活力

这一年,军旅新秀们在各类刊物的军旅专号上崭露头角,这些作家多半来自于基层,对于军营有着最直接和切身的体验,他们的创造为军旅文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茂戈的《报告姐姐》引入了一条姐弟情深的线索:年幼丧母又缺乏父爱的男孩程成,在姐姐的精心爱护下成长。姐姐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教导弟弟读上名牌大学,欣慰于弟弟走入了姐姐梦寐以求的地方——军营。这个亲情线索直接引燃了小说中的一个高潮情节:程成在陪护王钢班长的时候偶遇神似姐姐的护士丽,出于对姐姐的思念,程成激动之下打碎了班长的吊瓶,被医院认定为“恶性事件”,因此丢掉了预提培训班长的机会。这一事件在主人公短暂的军旅生活中是极具“破坏性”的,程成放弃了给领导当公务员的捷径,只想成长为优秀的军事主管。在数次睡梦中,他甚至成了那个参

谋长。然而,命运转折后,程成只是在炊事班作出了一次中途被叫停的尴尬报告,想象中完美利落的军礼献给了退伍后再一次见到的姐姐。戛然而止的结局、现实与真实的落差,赋予小说以余味,也让读者跟随着故事咀嚼出人物命运的苦涩。

言九鼎的《回锋》从主人公牛立民奔赴医院探望重病父亲开始,引出了一系列的人物。医院的重症病房是最易暴露人性的场所,面对生命的无常,轮番登场的人物或温情、或痛苦、或慷慨、或犹豫、或贪婪,读者跟随主人公的经历见证了一场场充满着人情世故、糅杂着苦辣酸甜的悲欢故事。团长牛立民、担任过村支书的父亲、曾经的战友李波、现在的下属刘启良、陪护家属张晓……每一个人都有鲜明的性格特征,作者巧妙地设置悬念,比如李波和牛立民的恩怨走向、寻找刘启良下落、牛父的病是否能够好等事件,从而把所有人“扭”在一个场所,情节紧紧地围绕人物关系展开。难能可贵的是,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好像身揣两副“系统”:一副在当下的医院,一副留在军营,两者之间时时呼应,交互重叠,互为因果。旧有的关系随着时间和场景的变化打破重组,人物也随之告别过去,收获了崭新的看待自我、看待过去、看待彼此的视角。在小说结尾,主人公牛立民重新思索军人的意义。在不算长的篇幅中,作者构建了一个军人世界和家庭、社会的多层面完整体系。

王亮的《复数长征》像一道密门,封藏着一个似真似幻、多维而又绚丽的战争世界。主人公陈焕和王瞳初次见面就以富有智性的谈话拨开新技术与新名词的迷雾,两人在真实与虚拟的循环往复中试图查找真相,进而阐释军人如何应对未来战争。这不仅是军人之战,也是人与机器之战,更是人与自我的认知之战。小说中对AI、人机交互和未来战场的描写显示出作者对新兴军事技术的深度钻研,在超越技术的层面,提出了一个新观念:人不仅会被无所所知,也可能被爆炸式的过剩信息误导。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认知大于智能和信息,这一观点是小说的核心,它无疑在人和智能机器的撕扯中,把主导权还给了人。

在宏大背景下挖掘个体的意义

2024年的军旅文学创作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在宏大背景下挖掘个体的意义,构建新历史观。艰苦卓绝的战争史和创业史是军旅作家天然且永恒的书写,作为“新生代”军旅作家的代表,朱昱鸾一直在作出拓进和转型的尝试,近两年从现实题材转入历史写作。新作《不饿简史》在描绘战争场景之余,让读者了解到人物成长的漫长轨迹。人物命运之所以在一场高紧迫度的战斗中得以最大限度地延伸,得益于作家的叙事方式。小说中每一个环节的推进都以时间做标题,时间的穿插、倒序的手法让主人公孙大脖子——一个战斗中并不居于重要地位的普通一

员,时明时暗、时隐时显地与长津湖战役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个体生命带动和辐射出整个战场的集体命运,裹挟着猝不及防的惨烈,让微小如尘的个体笼罩在强烈的英雄主义光环之中,生命终止在最耀眼的高光时刻。小说的结束方式颇有意味:一个鲜活的生命终于留下了名字,而这名字直接给予了食物。人活着需要食物,却也可以因食物而死。两者之间微妙又难以言明的联系,留给读者无限遗憾与喟叹。

兰宁远的《跨越九重天》向读者讲述了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初期的发展历程。王永志院士60岁时被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带领团队奋战在任务一线;戚发轫院士的爱人姜福玲被确诊为肺癌晚期,而他却无法陪伴在她身边……正因为有了这些无私奉献的先驱者,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才能从无到有,实现跨越式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2024年度中,文明的《黄河在咆哮》和黄兴国的《硝烟深处》读来令人不禁落泪,它们讲述着同一个主题:在战争中被吞没的青春和生命。两篇小说的背景都是局部战争,主人公是尚且稚嫩的解放军战士。他们在多数人享受平时时奔赴最酷烈的战场,日复一日在生与死的极限拉扯中无悔奉献。《黄河在咆哮》讲述的是西藏和平解放前夕的故事。汉族战士王志贤和藏族战士南德桑杰在战争中结下了亲如兄弟的友谊。他们一个渴望在西藏解放后荣归故里,成家立业;一个背负父母亲人被残害的仇恨,希冀通过解放摆脱过去,迎来新生。两个年轻的骑兵在一次危险来临时彼此救助,互相配合,既挽救对方的生命,同时也在获得心灵救赎。一次渡河时,骑兵班长王志贤忍着腿伤身先士卒,中途被急流卷入河水,不幸牺牲。英雄的魂魄注入黄河水中,其余队伍继续前行,1952年8月4日,骑兵支队到达果洛腹地,果洛随即宣布和平解放,但马背上那个年轻活跃的身影已永远的消失了。

不同于《黄河在咆哮》的激烈紧张,《硝烟深处》如同一首悠扬婉转的抒情诗。如果不是小说接近尾声那场骤然爆发的边境战争,故事更像是书写战士何书芳的成长史,写他如何来到军营,如何训练成长,如何对邻家女孩产生情愫,如何跟战友、跟老乡畅聊叙话。然而,战争改变了一切,一个因刻苦努力而脱颖而出的侦察班长怀着对英雄、对未来的渴望牺牲了,临死前下半身几乎被炸没。小说引着读者注目一个年轻生命绽放的姿态,引发猝然的悲痛后又戛然而止。两部小说的主人公有着相似之处,他们活得青春、热烈,怀着对和平生活的无限向往,在即将迎接幸福的时刻溘然长逝,淹没于如滚滚河流的历史当中。战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然远去,鲜少有人回忆起和平是以什么样的代价呈现的,也鲜少有人能记住故事中这样的小人物。然而,战争不仅指向过去,它或许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在最危急的生死关头,总有一些人因职业、因热血、因情怀、因责任与担当,必然地走到人民的前列。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

文学名刊
近作扫描

《钟山》《江南》《山花》《福建文学》《湖南文学》:

重返诗意的“麦田”

□林初晴

近日,“麦子阿姨”悄然走红网络。一生劳作于河南安阳的她,在花甲之年突然决定走出打转了一辈子的麦田,一路南下去实现自己20岁时已经萌发却始终未能实现的梦想。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想要逃离的“麦田”,“麦子阿姨”的故事引发了如此广泛的共鸣,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作家们总是孜孜不倦地书写一个个“出走”的故事。

无论是王明明《嘉年华》(《福建文学》2024年第12期)中身处小县城心向大城市的陈樵,张曦《残酒春欲晚》(《钟山》2024年第5期)中渴望逃离婚姻围城的允卿,还是钱幸《山隐》(《湖南文学》2024年第11期)中急流勇退的当红歌星焦庚女,他们的出走或是出于对物质生活的不满,或是出于对追寻自我的热望,总而言之,他们将当下庸碌的生活视为消解超越性的渊藪,试图以“出走”的方式与过去作别,开启一段崭新的人生。

然而,跨过对“出走”充满浪漫想象的“五四”时期,作家们不再将故事止步于出走的瞬间,而是开始反思:“麦田”之外,真的存在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吗?如果说李晨玮《寻隐者不遇》(《福建文学》2024年第12期)重新讲述了古老的“桃花源”的故事,那么王啸峰《水边的蓝喉蜂虎》(《钟山》2024年第5期)则是《桃花源记》的现代转写。主人公于乃今与一对中年伴侣相遇于与世隔绝的小岛,饱受现代社会焦虑困扰的三人在此却屡屡受到某种神秘的感召,各种超自然的景观不断重塑他们想象力的边界。之所以强调这篇小说的现代意味是因为,于乃今获得精神涤荡的“世外桃源”只是一场别有用心心的炒作,作者消解了“桃花源”的真实性,于乃今渴望安放灵魂之所不过是某种现代的消费装置。《山花》2024年第11期推出的海外华人作家小辑也同样呈现了出走之后的某种困境,其中南桥《临终关怀》塑造了一个出走异国举步维艰却

在国内亲属面前苦苦维持最后体面的游子形象。小说结尾,主人公伶仃地客死他乡,他的死亡最终化为一个仿佛叹息的问句:为什么不能回头?

可能的答案是,“出走”往往意味着拒绝被收编进现行体系,同样也意味着,任何回返的倾向都会被解读为一种受挫之后无可奈何的妥协,正如夏麦《白色巨塔》(《湖南文学》2024年第11期)中的主人公坦言:“回乡。这是她最躲避的事。”陈再见《我真是服了》(《钟山》2024年第5期)则是讲述了一个“叛逆”少女离家出走的故事。家境优渥的“我”在与母亲争吵后愤然离家,在好友柚子的带领下窥见了这座城市的另一面:肮脏狭窄的小巷、早早辍学的“混混”……这一切都是被母亲视为污浊而排斥在外的。“我”才惊觉自己虽然在小城生活了十几年,却只了解它的躯干而未触摸到它的肌理。这脱出固定轨道的一夜,使“我”与普通人心酸而

真实的生活产生了短暂的交叠,但当夜色褪去,太阳再次升起,“我”又被重新纳入既有人生轨迹。

吕阳明《冷却塔》(《江南》2024年第6期)也许能给我们另一个答案。在逃离故乡那座边境小城多年后,那里的风物时时入梦,“我”在无可抑制的怀旧冲动下重返家乡,发现儿时的玩伴赵麻秆依旧保留着一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生活方式。老平房、工装服、冷却塔共同构建起一个“记忆之场”(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语),在这些历经时间淘洗的留存之物上,“我”召回了自己逐渐消弭的生命印记,并在对过往温情脉脉的回忆中与故乡达成和解。可以说,这种精神复归弥合了因出走产生的“过去”与“当下”的裂痕,在断裂的自我认同上重新建立起了圆融的总体性,重返“麦田”这一行为也因此被填补了积极的向度。

倘若进一步反思,“麦田”让我们以为困于眼

前生活的庸俗与琐碎,才使得“出走”成为满足生存条件后的唯一选择。但正像“麦子阿姨”所说的:“过完这个冬天,我明年还得回家种麦子。”肯定“重返”的意义,就是破除对“出走”的路径依赖,重新发现日常生活的崇高与诗意。索耳《水干水大两头流》(《江南》2024年第6期)展现的是海上渔猎生活的诗性,人们所挥洒汗水的这片海洋形塑了他们的体格身躯与心理图式,显然已经成为此后一切意义破土萌芽、茁壮成长的土壤。而主人公从始至终对于“要不要上岸”的暧昧态度也就构成了这样一种隐喻:“麦田”从来不是与“远方”截然对立的,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出走”的焦虑就永远不能平息。文学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既能赋予人们走出“麦田”的勇气,又能重新发现“麦田”的风景,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从容地拔节生长,汲取四时的晨光,收获元气淋漓的生命。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生)